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下）

吳振漢

第三章 勝利接收與第二次流亡（民國三十四年——）

雖說抗戰勝利後，政府隨即展開接收東北的工作，但對許多東北人士而言，流亡的生涯始終未曾結束過，因為日本投降後，整個東北立刻全陷於俄人之控制，後又將部分地區轉交給前往接收的中共軍隊。即使在國軍軍事接收的全盛時期，新制九省中，也只能有效控制遼寧、遼北、安東、吉林四省而已，且此四省尚有部分地區有共軍出沒，而其他五省省政府只能寄居於哈爾濱、長春二市，等待無法實現的接收，中央政府力量既從未能進入松花江以北廣大地區，因此在國軍接收初期，便有大批學生和民衆湧入松花江以南國軍防區，國民政府行憲後民意代表之選舉，亦有不少地區代表是流亡民衆所選出來的。故就長期整體形勢而言，東北人士的流亡悲歌始終並未譜上最後的休止符。

自九一八事變後，流亡入關的東北人士，因不同理想、看法，發展出各種不同派系；而在東北現地抗敵人士，因抗戰期間中央對東北地下情報人員採複線領導方式，故亦是各有統屬，彼此甚至相互不知是同志。再加上勝利後中央派赴東北的接收人員，又多非東北籍人士，故勝利後的東北一時給人派系林立、接收工作混亂的印象。茲為便於分析，將此一時期重要人物分中央接收人員、返鄉東北人士和東北現地人士三類，再依時段加以敘述。

一、民國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六月

此一時期國軍接收順利，直抵松花江畔，文職人員也隨後完成遼寧、遼北、吉林、安東四省部分地區之政治、經濟接收。中央方面，自始即不願光復後的東北再回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的半獨立狀態，因此於抗戰末期，便在中央設計局中設臺灣、東北兩委員會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研究戰後復興建設事項，分由陳儀和沈鴻烈主持，而最高實際負責人則為設計局秘書長熊式輝。(註一〇六)

抗戰勝利後，熊式輝隨即被任為軍事委員長東北行營主任，並兼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成為東北政治方面最高負責人。熊氏雖係軍人出身，但歷任政治、外交要職，一向被視為所謂「政學系」(註一〇七)的要角。東北人士原以為張學良會受命重返東北主持大局，後得知由熊式輝主政，已大失所望，而熊氏又任用親信，(註一〇八)其親戚更組織「中美公司」，把持瀋陽交通特權，(註一〇九)招致東北人士普遍不滿。

東北經濟接收方面的主要負責人是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張氏雖亦被視為政學系要人，但處事端方、操守清廉，惟略欠政治統御領導之才。被謠傳牽連在內。(註一一〇)而整體經濟接收工作，先受俄人阻撓，後又受國共戰爭的破壞，始終進行的並不順利。

軍事接收方面負責實際責任的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下轄五十二軍、十三軍、新一軍、新六軍、七十一軍、六十軍、九十三軍、二〇七師等部隊，其中除六十和九十三軍係滇系部隊外，其他均為中央嫡系中的精銳，新一、新六兩軍更是當時所謂「五大王牌軍」中的兩支(其他三支分別是第五軍、第十八軍和第七十四軍)。杜聿明為陝西人，精於處人之道，故被東北人士視為「也算咱們北方人，作事與我們東北人差不多」。(註一一一)但中央嫡系軍隊在抗戰期間大為擴編，且長期分區駐防作戰，派系已分，故杜聿明指揮接收作戰時，先與十三軍軍長石覺意見分歧，後又與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失和，影響戰局頗大。

當時中央政府的接收政策是視東北地區為一整體，故政、經、軍均有一統籌九省的負責單位，惟獨黨的方面，卻因俄人的阻撓，及熊式輝不欲黨內派系與之爭權，(註一一二)始終無一整合全東北的黨務機構。如此非但造成熊式輝在東北權傾一時，也使得從事黨務工作者無法在決策規劃層面擔負責任，而傾力於省級以下黨部常務性職務的爭奪。東北人士自入關後，有政治企圖心者，多與國民黨內派系結合，而乏人與活躍政界的政學系往來。接收時始終沒有統籌九省的黨務機構出現，遂使得東北人士對整個接收計劃無著力之處。

中共方面的接收工作則係黨政軍三位一體，而且行動快速，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即以彭真、陳雲等人組成「中共東北局」，次日，便在瀋陽大帥府召開會議。十

二月正式組成「東北民主聯軍」，由林彪任司令員，副司令員為呂正操、李運昌、周保中、黃克誠，彭真任政委。至於統籌東北政務的「東北行政委員會」，則遲至民國三十五年七、八月間方成立，林楓為主席，張學思、高崇民為副主席，其功能遠不及「東北局」重要。(註一一二)

綜觀以上所述可知，無論國共兩黨的接收工作，均視東北為一整體，且二者均無意讓東北地區再重返九一八事變前的半獨立狀態，故統籌整個接收工作的人員均非東北籍。但在省籍以下的接收人員，國共雙方均不得不借重九一八事變後流亡入關的東北籍人士。

抗戰中期，中央政府恢復東北四省建制，分別任命萬福麟、鄒作華、馬占山、繆徵流為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主席，但抗戰勝利後，中央卻指派熊式輝主持東北接收工作，並將原東三省劃為九省。新制下的九省二市主管人選（瀋陽市長人選初未定，後由董文琦出任），分由各界推舉候選人近百人，再由熊式輝、張羣、吳鼎昌三人審察後，推薦給蔣委員長做最後的圈定。(註一一三)結果選定的人選是遼寧省主席徐箴、安東省主席高惜冰、吉林省主席鄭道儒、松江省主席關吉玉、遼北省主席劉翰東、合江省主席吳翰壽、黑龍江省主席韓綏傑、嫩江省主席彭濟羣、興安省主席吳煥章、大連市長沈怡。哈爾濱市長楊綽庵。

這些人選中，除鄭道儒、沈怡、楊綽庵（三人結果均未能實際赴任）為政學系有關人物外，其他諸人均為東北籍人士，但因長期流亡關內，投身各界服務，故出身、派別極為複雜，其唯一共同點便是均為蔣中正所賞識的行政幹才。這批壯年幹才雖操守能力均有可觀之處，但「皆為年輕一輩，在東北人民腦海中極少印象」，(註一一四)對久陷日人統治之下的東北人民，殊欠號召力。而其上又有統合九省的政、經、軍單位節制，即使在確實完成接收的省、市，主管人員亦只能「隨軍進退，奉命行止，……均無補於大局」，(註一一五)至於未能接收之省市則更無論矣。

九一八事變後，「流亡關內之東北人士約在五十萬上下，其中一部分為軍公教人員，在大後方各省輾轉流離間，遭逢戰亂，工作機會甚少，常受歧視，或遭排擠」，「他們一心一意所期盼者，就是早日復土返鄉」，(註一一六)而要衣錦榮歸，最好能謀一接收人員職務，於是省府廳、處長等職務，乃成返鄉流亡人士積極爭取的工作，結果往往接收實務未辦，派系傾軋已成。(註一一七)這些人事糾紛，從抗戰剛勝利時的南山地區，一

九一八事以來變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直延續至接收後的東北，無怪乎抗日名將馬占山慨嘆道：「我們東北人在外流浪十幾年，吃的苦頭最多，……現在能夠回來的人才幾天，大家就這樣吵吵鬧鬧，實在是笑話」。(註一一九)

國民黨各省市黨部方面，因在「滿洲國」時期，黨務工作均係複線發展，故更是派系林立，其中尤以CC派、朱家驊和汪青崗派為主。各派系之間爭執「劇烈的程度，甚至到雙方在牆壁上貼標語對罵，在餐館中吃飯遇到一起時，雙方會怒目相視」，「這些內部之爭，使得一些知識份子很失望，因為雙方都忽略了共同的敵人共匪」。(註一二〇)

中共方面，各省省主席亦多委派東北籍流亡入關的左派人士擔任，張學思、高崇民、閻寶航、于毅夫、栗又文等人，均先後擔任過省主席。不過中共接收東北工作的重心是黨和軍，任用這些政治人物，只為政治號召，並未賦與太多實權，當中共佔領整個東北後，此輩紛紛被調職中央，也未能真正治理東北家鄉。

至於東北當地人民，則先受了日本人統治之屈辱，(註一二一)後又遭俄人蹂躪，並不得不成為「滿洲國」之人民，若深究其苦難命運之原由，實「是國家丟掉了東北民衆，是政府放棄了保護人民的責任」，而東北「國民殊無負於國家，永持懷念故國的孤臣孽子」。(註一二二)但勝利後他們卻被部分接收人員視為「偽民」、「偽商」、「偽教授」、「偽學生」，其心中不平可想而知。再見到部分接收人員們的貪污腐化情形，東北人民更是憤恨不已，即連對一些回來接收的同鄉，亦迭有怨言：

這些小子也算「衣錦榮歸」一場，其實都是回來作官的。什麼叫拯救東北同胞於水火？何嘗解除鄉人半點苦痛？真讓我們失望！清勢危急了，又都掉頭不顧的跑了！(註一二三)

不滿之情溢於言表，再加上中共刻意的爭取，東北民心便逐漸轉向了。

二、民國三十五年七月至三十七年十月

此一時期，國軍在東北的戰事逐漸失利，中央政府轄區，由面成線，再退縮到點，終而完全失陷，東北人士也隨之踏上第二次流亡的旅程。惟此次流亡歷程較前次更為艱辛，時間也更長。

民國三十五年下半年，是國共和談時期，松花江畔暫無戰事，但情勢已在轉變之中，江北的共軍正積極整補，蓄積戰力；而江南的國軍卻開始腐化，戰力日消。三十六年

初春，共軍便開始展開攻勢。是年夏季，國軍疲態已露，蔣中正方意識到局勢嚴重，於八月末正式任命參謀總長陳誠兼東北行轅主任，接替熊式輝。

陳誠在東北人士議論中，是一個毀譽參半的人物；不似熊式輝和衛立煌，是完全負面的人物。陳氏主政素以剛強清廉著稱，至東北後，對貪污濫權情事大肆整頓，政風為之一變。另外，陳誠在東北黨務方面，有三青團系全力支持；他又調東北軍系的四十九、五十三兩個軍回東北戰場。四十九軍軍長王鐵漢與陳誠淵源深厚；五十三軍則在抗戰期間，分別在第九和第六戰區，兩度受陳誠指揮，軍長周福成又與陳誠是保定軍校同學。（註一四）惟此際東北戰局已成頹勢，此兩個軍竟未能在家鄉充分發揮戰力。

而陳誠主政東北時期，最受人批評之處，乃在於其剛愎自用，只信任正規軍，而將東北地方保安部隊裁撤、整編。東北保安部隊中，固然有濫竽充數或吃空缺的情形，但亦有不少的確是一心報國的東北健兒，如此不加區分地一併裁整，難免招致東北民怨，更為林彪部隊驅來大批兵源。後陳誠去職養病滬上時，遇見來訪的東北人士，還一再表示：「東北之行，對不起國家，對不起同胞！」（註一五）

民國三十七年初，東北局勢更形惡化，陳誠亦無法挽回劣勢，乃赴上海養病。中央另組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由衛立煌任總司令。衛氏乃北伐、剿共時代名將，但此時已腐化不堪，雖知此行困難重重，但眷戀名利，仍走馬上任。上任後以自保為最高原則，集重兵於瀋陽周邊，另分遣部隊防守長春、錦州，以不失要地、續保名利為第一要務。

正值此局勢險惡之際，東北地區也與國內各地一致，開始選舉民意代表，準備行憲。此次選舉可謂是一流亡選舉，即以吉林省為例，其時該省只剩吉林、長春二市，尚在國軍掌握之中，民意代表乃由該省流亡在該兩市難民選出。至於松花江以北各省民代，則盡由其旅居遼瀋選民選出，（註一六）其代表性可想而知。

而選舉本身更是弊端百出，作票舞弊情形屢見不鮮。當時黨政大員，頗多投身選舉，其所持理由，黨方人員是訓政時期以黨治國，憲政時期黨務人員自應轉任民代；政方人員則稱要印證其在家鄉的民意基礎。然若深究其實，多不免是見東北局勢日益險惡，不如藉此機會「溜之大吉」。（註一七）無怪乎一些東北人民怨憤的指出「九一八時候，官員把人民丟下跑了，讓他們受了十四年的異族迫害，現在共匪還沒攻城，而大官們卻已作逃走的計劃，又把他們丟下任由共匪宰割」。（註一八）選舉結果，國民黨大老朱霽青，及前東北大學校長臧啓芳皆落選，臧啓芳甚至憤憤不平的不肯接受選舉結果。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註一三九) 因此行憲選舉非但未能結合東北派系、民意，反使之更加分裂。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政府決定放棄吉林，向長春撤退，「約八萬民衆（包括長白師範學院學生），捨掉田園廬墓及一切財產，隨國軍長達數十里的行列，男女老幼，徒步三百餘里，沿著吉長鐵路沿線邁進」，大規模的流亡行動，再度開始，惟其悲慘程度較九一八時，恐有過之而無不及：「爲了避免共軍下面襲擊，夜行日宿，沿山掩護，依然屢遭衝斷掃射，萬千老弱死於途，妻離子散，哭聲震天地」。(註一四〇)

隨著大舉流亡行動的發生，類似九一八事變後的各種活動也陸續開始。先是東北人士組成「東北請願團」赴京請願。三十七年春，第一支請願團由遼寧省議會議長李仲華、瀋陽市議會議長張寶慈、遼瀋議會法團代表王化一、「東北建設協會」代表田雨時四人組成，背負東北民意赴南京請願。抵京後，除晉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外，並分別會晤行政院長，及國防、財政、經濟等部首長，又列席國民黨中常會，控訴「接收大員與不肖的軍政經官吏違紀非法；籲請速定大計，挽救危亡」。(註一四一) 與會中長委爲之震驚。

請願團離京前召開記者招待會，控訴外國侵略者，與中國反叛集團勾結，不過這次被控訴者不再是日本和偽滿，而是蘇俄和中共。會中尤其大力駁斥當時京中一些言論——主張「政府宜持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索性早日犧牲東北，作爲換取關內和平的條件」。(註一四二) 東北人士怕被中央犧牲的流亡意識，再度表露無遺。

是年四月，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時，東北籍國代孔憲榮以「屍諫」企圖挽救東北危局，朝野震驚。孔憲榮原籍山東，九一八事變後，一度留在東北打游擊。抗戰勝利後，爲杜聿明任命爲東北保安第二支隊司令，返吉林收容昔日抗日舊部，得二萬餘人。後與共軍作戰負傷，至關內療養，待傷癒返東北，發現所部給養極度缺乏，後更遭編遣，因而對陳誠及吉林省主席梁華盛頗有微詞。(註一四三)

行憲後，孔氏雖當選松江省國大代表，但仍志在重返東北戰場，原欲藉進京開會之機會，向當局及國人痛諫東北之慘狀，但連日所見「國民大會內外，凡『絕食』、『抬棺』、『主席團拉票』、『黨內相競副總統』，一連串地在爭權奪利」，痛心之餘，乃決定「屍諫」，以冀「足以諫正權要，挽回東北與國家危運」，(註一四四) 終於四月十五日下午，自經於南京東來旅館。孔憲榮之死，一時激起在京開會的東北籍二、三百名國代同仇敵愾之心，除集會致哀外，並推舉二十餘名代表，向國府蔣主席懇切建言，頗受

採納，然大局已壞，勢難挽回。

此外，學生運動也再度爆發。九一八事變後的學運，最初純係一抗日愛國運動，直至「一二九學運」之後，才逐漸變質。此外學運則全然不同，早在勝利接收之初，共黨職業學生已潛伏入東北各大學院校，而國民黨亦利用青年軍二〇七師復學學生為耳目。並且此次學運訴求目標，也不再是崇高的抗日愛國，而是赤裸裸的意識型態鬥爭。有心學生刻意利用流亡意識，擴大學潮，以遂其政治目的。而歷次與東北流亡學生有關之學潮中，以「七五事件」最具代表性。

民國三十七年夏，東北四院校(東北大學、瀋陽醫學院、長白師範學院、長春大學)已開始分批陸續遷往北平，尋覓校址，預備從是年秋季起在北平開課。一時之間，大批東北流亡學生湧入北平，造成北平市社會治安等問題，於是便有議員在市議會中提議徵流亡入關學生當兵。七月四日，北平各大報披露此一消息後，立刻激起東北流亡學生強烈的不滿情緒，左傾的「北平學聯」也表示同情。

七月五日，以東北大學和長白師院為首的學生隊伍便走上街頭抗議。他們「沿路高呼『反對市議會的非法提案』、『要求許惠東(北平參議會議長)道歉』、『反對非法學生思想審查』、『反飢餓、反壓迫、反內戰』、『反對徵兵當炮灰』、『要讀書、要自由、要活命』」。(註一三五)學生隊伍先衝進北平市參議會，損毀一些辦公用具和車輛，並將「北平市參議會」的匾額，用黑漆塗改為「北平市土豪劣紳會」。至十時左右，北大、清華學生亦加入示威隊伍，轉向當時華北最高負責人李宗仁請願，再轉往東交民巷許惠東家抗議，遭憲警阻攔。(註一三六)至傍晚，「包圍許宅的學生，在翻越院牆，企圖打進許宅的時候，與守軍二〇八師發生衝突，開了槍，有很嚴重的死傷」。(註一三七)後據統計，東北學生共被打死九名，其中包括長白師院學生六名，東大先修班一人，另負傷百餘名。(註一三八)

慘案發生之後，長白師院左傾學生為死亡同學設置靈堂，並發表演說，激起同學流亡情緒，使「大部分存著『看熱的心情』的中立者，在靜心自反的時候，被他們用眼淚侵入仇恨的毒素，引導踏上反政府的道路」。(註一三九)因此又有七月九日，東北、華北學生聯合走上街頭遊行示威之舉。學生高舉「反輒民、要活命」標語，抬死難同學畫像遊行。高呼「傅作義該槍斃」等口號，並成立「東北華北學生抗議『七五慘案』聯合會」。(註一四〇)此次遊行幸未釀成事端。

七月二十二日，長白師院青年軍復員學生被調至西苑，參加國防部預幹局主辦的暑期幹部教育營。左傾學生少了掣肘力量，更加活躍，主控學生自治會，並欲驅逐校內訓導人員。七月末，因公費不能按期發下，左傾學生藉此機會，與校方之對抗更爲激化。左、右兩派學生之間，更因誰才是造成東北學生流離失所的罪魁禍首，而發生鬥毆事件。八月初，青年軍復員學生返校，組成「復校復課委員會」，右派學生方有一正式組織。八月四日，憲警人員進入校園，「護校會即當眾提議檢舉匪嫌份子，這是首惡份子劉殿來和程淑媛二名見風頭不妙，已先行逃避，其餘當場被憲警帶去羈押十八名」，(註一四一)此即所謂的「八四事件」。此一事件「直接影響到『八一九』全國大舉逮匪諜學生的壯舉，爲政府在學校公開逮捕匪諜，開了先河」。(註一四二)「八四事件」後，長白師院得以順利在是年八月中旬開課，但不久隨著華北情勢惡化，該校師生又踏上更長、更辛酸的流亡旅程。

三、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下旬，東北全陷。而華北、華中情勢，緊接著急轉直下，因此東北人士在毫無喘息機會的狀況下，幾乎是毫無組織的一路流亡至臺灣，其路途之漫長、過程之艱辛，均遠超過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一次流亡。有關這次流亡的個人經歷之回憶，資料甚多，不堪縷述：茲僅以當時可能是人數最多的東北流亡團體——長白師院爲例，記述這一段流亡過程。

自東北局勢逆轉後，長白師院便從松花江畔的吉林，經撫順，遷至北平。民國三十七年「八四事件」後，在北平開課方三個月，山海關便失守，林彪部隊入關，該院院長方永蒸奉教育部命，往衡陽南岳勘覓校址，在湖南衡陽設辦事處，上海設招待所，準備南遷。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該院第一批南遷流亡學生七十二人，抵達衡陽。是月底，北平失守。二、三月間，該院學生又有二、三百名，陸續離平抵衡陽，遂在湖南國立師範學院借讀。及至五月，湖南省主席程潛和駐守衡陽之最高軍事長官陳明仁，已有與中共局部和談之意圖，長師師生乃又不得不再南遷廣州。

六月上旬，該院師生初抵廣州，因教育部公費遲遲不能撥下，生活窘迫異常，造成「日後很多同學罹有因營養不足而引發的慢性疾病」。(註一四三)因當初未經教育部同意

，便自衡陽撤至廣州，故經數月的奔走請託，方被核准復校。於是該院乃借用海南島瓊山縣府城鎮瓊海中學的一部分校舍，於九月間再度開課。

惟好景不長，民國三十九年初，海南島亦面臨撤守命運。長師學生又分數批，配合國軍撤退航次，逐步撤至臺灣。其中較幸運的兩批，一批是「以山東籍的同學為主三十五人，與趙琳軍長取得聯繫，參加該軍軍中學生服務隊，隨三十二軍赴臺，另一批共八十六人，以東北籍同學為主，隨遼南綏靖總指揮部乘天平輪至高雄」。(註一四四)另一批一百七十四人，乘成安軍艦抵達澎湖馬公，卻因入境證未辦妥，不准登岸，而被拘限在一艘報廢的軍艦上，達四個多月。最後一批殿後師生共八十餘人，則先被送海南島最南端的三亞，使這批來自極北的青，卻在最南疆羈留了近三個月，最後才在共軍炮火下，被接運來臺。是年六月六日，所有長師師生終於全體抵臺，後轉往臺北，借住臺北師範學院。在數度申請復校不成後，教授由教育部安排工作，員工遣散，學生送往青年服務團，重施訓練。「一個完整的學校，在敵人的炮火之下，尚可以茁壯成長，發揮高度力量，等到他一旦投入了慈母的懷抱，正在天真的興奮鼓舞之餘，她竟因營養失調，猝然暈厥，終於休克了」。(註一四五)最後的一個流亡團體，至此結束。

然東北來臺人士仍個別保有其本土性格和流亡意識，此一傾向除反映在其特別緊密的同鄉會、同學會組織外，在民意機構中尤其顯著。因東北九省民意代表，往往被視為一個整體，故其在立法院和國民大會中，人數遠超過其他各省，其動向影響也就特別引人注意。

來臺之初有兩位東北籍民意代表均因直言不諱，而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一位是立法委員齊世英，齊氏自陳立夫出走美國後，隱然是立院CC派的首腦。民國四十三年，行政院提出電價上漲百分之三十二的議案，但立委電力審察小組則主張只漲百分之十三。是年十二月十七日。黨部就電費漲價一事召開第二次座談會中，齊世英仍堅持己見，主張最多只能漲百分之十八。十二月二十日，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常會，會中「遵照總裁條示，決議開除齊世英黨籍」。(註一四六)齊氏被畢生忠愛的黨開除後仍一本東北硬漢個性，堅不認錯。一度雖與雷震、高玉樹等接近，有另組一新黨之意圖，但又因理想不合而與之分開，長期流亡生涯所造成的不安全感，隱然呈現。

另一人為監察委員曹德宣。曹氏為老國民黨員，張作霖時代起，即在東北從事革命工作。行憲後，當選監察委員，並追隨政府來臺。當政府外交逐漸陷入困境後，曹氏公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然主張「兩個中國」政策，因而遭開除黨籍，抑鬱以終。(註一四八)「組黨」及「兩個中國」主張，在當時均是政治禁忌，但兩位東北民代卻勇於提出，其正直剛烈的本土性格可見一斑。

近年來又有東北籍立委費希平先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後又自動脫離其參與建立的民進黨；以及立法院長梁肅戎對立委同志支持其當選院長，後又公開逼退，表示極度不滿，是皆可看出其東北本土性格和流亡意識的流露。不過這些時事均剛發生不久，歷史深度不足，或許更適合政治學者或理學者分析研究。

留在大陸的知名左傾東北籍人士，雖未受第二次流亡之苦，但其後來境遇卻更為淒慘。一九五四年，中共正式批判所謂「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因高崗曾主持過東北黨政工作，一些東北人士頗受牽累。(註一四九)而著名東北人士遭到慘酷打擊，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首先受到打擊的是海軍司令部參謀長張學思，張學思因不與林彪親信，海軍黨委第一書記李作鵬妥協，而於一九六七年九月被拘捕入獄，遭污陷為所謂「東北叛黨集團」一份子，三年後病死獄中。(註一四〇)

而閻寶航、高崇民等人，因在九一八事變後之流亡時期，與國民黨有所接觸，且與周恩來關係密切，因此遭「四人幫」忌恨，文革期間，均將之打為以呂正操為首的所謂「東北叛黨集團」，閻寶航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被拘捕，高崇民於次年十月入獄，先後死於獄中。(註一五一)張、閻、高三人，至死皆不知何以又成了「叛徒」、「特務」。

而在中共統治下的東北，似乎仍是一特殊化的邊陲地帶。近年來因批評時政，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東北籍報導文學作家劉賓雁在其自傳中云：「對人的才智愚鈍化、白癡化和對於人的創造精神的宰殺，在我的家鄉黑龍江省效果特別明顯」，「一九四九年以後，則有三十年之久那裡沒有生長過一個作家」。(註一五二)一個近代以來素以產生豪邁敢言人物著稱的地區，居然在集權統治摧殘下，變得寂靜無聲了。

結 論

東北籍黨政元老朱鬻青流亡來臺後，在一次與同鄉友人聚會中說：「關東三省，介乎日俄兩大之間，外交關係極其微妙，革命同志苟一不慎，即蹈張邦昌與劉豫之覆轍，且我每次東北政局之演變，咸為革命同志發動於前，而我軍政妥協於後，因此東北革命

之結局，恆被全國整個權益所犧牲」。(註一五三)頗能說明東北地區在近代史中所處之困境，並道出東北人士長期以來的委屈與辛酸。

遼東地區早即被納入漢民族的版圖，惟明清之際的戰亂，導致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內徙，直至康熙、乾隆之後，才又有關內漢人潛入東三省，但清廷仍屢申封禁政策。迄清末日俄交侵，清政府方改採馳禁政策，此後關內過剩人口大量擁入東北，至九一八事變時，漢人已在東北佔絕大多數。但這並不意味近代東北文化完全是漢化的結果，事實上，漢人出關後，為適應新環境，亦不得不對既有文化做相當的調適，並吸收當地文化所長，而形成一種本土文化。另一方面，在東北某些地區，受日、俄文化的影響也是十分顯著的。因此我們必須瞭解這本土文化，也惟有如此，我們才能確切明白相應於這種本土意識而產生的流亡意識。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件爆發，大批東北人士流亡入關，很快的他們便發現中央政府和關內同胞的處事態度、對時局的認知、以及對未來的打算，都與他們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流亡意識遂逐漸產生。為求生存、發展，東北流亡人士組成各種團體，派系也漸形成，一派為擁護張學良的主流派，另一派為傾向中央政府的非主流派。主流派主張支持張學良，並不斷對中央施壓力，以團結全民力量，早日打回東北。非主流派則排斥張學良的領導，主張配合中央既定政策，終有一天會重返家鄉。在日益高漲的流亡意識驅使下，東北主流派終於引發了「西安事變」和「一二九事件」。經此兩次慘痛的教訓，東北流亡人士中的穩健溫和派逐漸成為主導力量，而部分左傾極端人士遂全面倒向中共。

勝利返鄉原是東北流亡人士夢寐以求的事，但抗戰勝利後的接收之行，很快的變便成一場噩夢。中央所委派的外地接收大員，不甚瞭解東北的實況與需求；而返鄉的東北人士卻因長期流亡所造成的分裂，使得各派系間水火不容。最感失望的還是東北現地人民，他們受了異族十四年的凌辱，所盼到的「接收」結果成了「劫收」。隨著民心、戰局的逆轉，東北人士又開始了流亡歷程，類似第一次流亡時的請願運動、學生運動，也再度爆發。歷經千辛萬苦，部份東北人士終於流亡到臺灣，但在民意機構裡，我們仍時見其本土性格和流亡意識的流露。而留在大陸的早期著名流亡人士，也人多因其直爽性格和流亡歷史，而付出慘痛的代價。

「流亡」實際上是中國現代史中的一普遍主題，並非東北人士所特有。抗戰期間，國土東半壁各省同胞，許多都歷經流離之苦，逃向大後方。國共戰爭更導致全國各省皆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有同胞奔赴臺灣。但兩次流亡潮皆始自東北，換句話說，東北人士的流亡路程最遠，時間也最長，故其流亡意識也就最爲顯著、重要。經過本文的探討，也許我們對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已獲致更深入的瞭解，但何以近代史中，各地中國人都要一再歷經流亡之苦，仍值得我們三思。（本文之寫作曾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特此致謝。）

註 釋

註一〇六：吳相湘〈熊式輝治軍行政外交〉，《民國百人傳》第四冊，（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一一九七一）。

註一〇七：所謂「政學系」與「CC派」一樣，係一非正式的黨政小組織，其成員從不承認其爲一特殊利益團體；但從外人眼光觀之，則其成員互相援引結合，又隱然是一派系。

註一〇八：董文琦《董文琦先生訪問紀錄》頁二八五。

註一〇九：陳嘉驥《白山黑水的悲歌》（遠流出版社，臺北，一九八六），頁二〇九；田雨時〈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四）〉，《傳記文學》三六卷二期，頁九九至一〇〇。

註一一〇：田雨時〈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四）〉，頁一〇〇。

註一一一：陳嘉驥《白山黑水的悲歌》，頁一六二。

註一一二：田雨時〈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四）〉，頁二六。

註一一三：汪文江〈光復後張學思同志在東北〉，《遼寧文史資料》第十輯，頁四六至四七。

註一一四：沈怡《沈怡自述》，轉引自《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央文物供應社，臺北，一九八八），頁七八四。

註一一五：李金洲〈西安事變親歷記（四）〉，《傳記文學》二十卷三期（一九七二），頁二六。

註一一六：張式綸《張式綸先生訪問紀錄》，頁一九九。

註一一七：同前書，頁九九。

註一一八：田雨時〈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一）〉，頁二三。

註一一九：陳嘉驥《白山黑水的悲歌》，頁一六一。

註一二〇：于衡〈國軍接收後的長春〉，《傳記文學》二十卷二期（一九七二），頁三一至三二；另〈包一民訪問紀錄〉及〈費希平訪問紀錄〉中也都印證了這種派系鬭爭的激烈情形。

註一二一：日本人之統治雖強橫，但尚重制度管理；而抗戰勝利後的接收工作，則經常全無章法可言，這亦是東北人民對國府接收普遍失望的原因之一。參閱〈韓振學訪問紀錄〉。

註一二二：田雨時〈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三）〉，《傳記文學》三六卷二期，頁八三。

- 註一二三：田雨時〈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六）〉頁二三。
- 註一二四：王鐵漢《王鐵漢訪問紀錄》頁一六四至一六七。
- 註一二五：谷振寰〈第五十三軍參加東北內戰概述〉，《遼瀋戰役親歷記》（文史資料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五），頁六〇一。
- 註一二六：田雨時〈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六）〉，《傳記文學》三六卷五期，頁八八。
- 註一二七：同前文，頁八五。
- 註一二八：同前文，頁八六。
- 註一二九：于衡〈陳誠、熊式輝走馬換將〉，《傳記文學》三十卷三期（一九七二），頁六七。
- 註一三〇：戚聲方〈哲先回憶錄〉，《東北文獻》三卷四期（一九七三），頁五十。
- 註一三一：田雨時〈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六）〉，頁八六。
- 註一三二：同前文，頁八七。
- 註一三三：同前註。
- 註一三四：栗直《東北抗暴列傳》，頁一八二至一八四。
- 註一三五：田雨時〈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六）〉，頁八七。
- 註一三六：姜濟民、王思凌、李紹隆〈東北學生「七五慘案」紀實〉，《東北地方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三期，頁十五。
- 註一三七：同前文，頁十六；《大公報》（天津）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六日第三版。
- 註一三八：焦毓國〈從「七五」到「八四」〉，《長白三十年》，（長白師範學院校慶特別編輯組，臺北，一九七六），頁五五。
- 註一三九：姜濟民等〈東北學生「七五慘案」紀實〉，頁十六；另有一說稱長白師範學生共死七名（見焦毓國〈從「七五」到「八四」〉，頁五五）。
- 註一四〇：焦毓國〈從「七五」到「八四」〉，頁五六。
- 註一四一：姜濟民等〈東北學生「七五慘案」紀實〉，頁十七。
- 註一四二：王克明〈「八四」追記〉，《長白三十年》，頁九二。
- 註一四三：焦毓國〈從「七五」到「八四」〉，頁六〇。
- 註一四四：王緒文〈從南嶽到廣州〉，《長白三十年》，（國立長白師範學院旅臺校友會，臺北，一九八一），頁二四七。
- 註一四五：〈院史〉，《長白三十年》，頁三三。
- 註一四六：同前文，頁三六。
- 註一四七：袁岡〈國民黨立委齊世英被開除了黨籍嗎〉，《自由中國》十二卷一期（一九五五）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頁五三。

註一四八：〈費希平訪問紀錄〉；〈項乃光訪問紀錄〉；田雨時〈齊世英先生蓋棺論〉，頁四一。

註一四九：田雨時〈齊世英先生蓋棺論〉，頁四一。

註一五〇：田雨時〈「東北光復與再淪陷」刊後感〉，《傳記文學》三八卷六期（一九八二），頁一二八。

註一五一：關國燾〈張學思其人其事〉，《傳記文學》四九卷六期（一九八六），頁三四。

註一五二：高存信〈高崇民同志年譜〉，頁一〇五。

註一五三：劉賓雁《劉賓雁自傳》（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臺北，一九八九），頁二〇六。

註一五四：劉心皇《東北英豪——朱霽青》（近代中國雜誌社，一九八六），頁一九二。

附錄一

引用書籍目錄

王鐵漢	東北軍事史略	傳記文學雜誌社	臺北	一九八二
西清	黑龍江外記	藝文印書館	臺北	一九六八
吳振臣	寧古塔紀略	藝文印書館	臺北	一九七〇
沈亦雲	亦雲回憶	傳記文學雜誌社	臺北	一九八〇
東北文化社 年鑑編印處	東北年鑑	東北年鑑編輯委員會	瀋陽	一九三一
長白師範學院 校慶特刊編輯	長白三十年	國立長白師範學院 旅臺校友會	臺北	一九七六
同 右	長白三十五年	同 右	臺北	一九八一
徐新生	一二九運動與民先隊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 研究所碩士論文	臺北	一九七五
梁直	東北抗暴列傳	東北文獻社	臺北	一九八八
陳嘉驥	白山黑水的悲歌	漢威出版社	臺北	一九八六
傅虹霖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時報文化公司	臺北	一九八九
楊賓	柳邊紀略	藝文印書館	臺北	一九六五
劉心皇	東北英豪——朱霽青	近代中國雜誌社	臺北	一九八六

劉紹唐 編	國立東北中山中學 金禧紀念集	國立東北中山中 學旅臺校友會	臺北	一九八四
劉健群	銀河嚮往	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	一九六六
劉賓雁	劉賓雁自傳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	一九八九
錢公來	東北史話	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	一九五九
謝爾楨	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	臺灣開明書店	臺北	一九六九
李維城	西安事變親歷記	中國文史出版社	北京	一九八六
	王鐵漢先生訪問紀錄	中研院近史所	臺北	一九八五
	董文琦先生訪問紀錄	中研院近史所	臺北	一九八五
	張式綸先生訪問紀錄	中研院近史所	臺北	一九八六
谷振寰	遼瀋戰役親歷記	文史資料出版社	北京	一九八五
萬福臨 修 張伯英 纂	黑龍江志稿	文海出版社	臺北	一九三二

附錄二

引用論文目錄

大公報	天津	民國二十年	九月二十九日	第五版
大公報	天津	民國二十年	十月二十五日	第七版
大公報	天津	民國二十年	十一月七日	第三版
大公報	天津	民國二十年	十一月六日	第七版
大公報	天津	民國二十年	十一月七日	第十一版
大公報	天津	民國二十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	第三版
大公報	天津	民國三十七年	七月六日	第三版
于國勳	關於所謂復興社的真情實況		傳記文學 一九六二	三五卷五期
于衡	國軍接收後的長春		傳記文學 一九七二	二十卷二期
于衡	陳誠、熊式輝走馬換將		傳記文學 一九七二	二十卷三期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王大任	一篇反共救國護校血淚奮鬥史	東北文獻 一九七〇	創刊號
王匡	談于總司令學忠先生生平	東北文獻 一九八三	十四卷一期
王思浚 姜濟民 李紹鋒	東北學生「七五慘案」紀實	東北地方史研究 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王德溥	五十年政治生涯記	東北文獻 一九七二	三卷四期
王盛濤	西安事變善後殉難的王以哲	東北文獻 一九七二	三卷四期
田雨時	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	傳記文學 至三十六卷七期一九八〇	三五卷六期
田雨時	齊世英先生蓋棺論	傳記文學 一九八七	五一卷四期
田雨時	東北光復與再淪陷〈刊後感〉	傳記文學 一九八二	三八卷六期
田雨時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致于學忠函	傳記文學 一九八一	四十卷一期
申報	上海 民國二十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六版
李田林	重慶南山東北人物瑣憶	傳記文學 一九七〇	十七卷四期
李世鏡	我如何俘獲匪首葉挺 ——解決「新四軍事件」作戰回顧	東北文獻 一九八四	十四卷四期
李世鏡	有關俘獲匪首葉挺答客問	東北文獻 一九八四	十五卷一期
李江春	憶東北中學	遼寧文史資料 遼寧人民出版社 瀋陽	第十輯 一九八四
李宗穎	略述東北大學	遼寧文史資料 遼寧人民出版社 瀋陽	第八輯 一九八四
陳彥之	記東北大學進步學生 抵制國民黨接管的鬥爭	遼寧文史資料 一九八七	第十輯
李金洲	西安事變親歷記	傳記文學 至二十卷三期一九七二	十九卷六期

- | | | | |
|-----------|-------------------|----------------------------|----------------------------|
| 李雲漢 | 西安事變的前因與經過(一) | 傳記文學 | 三九卷六期
一九八一 |
| 沈怡 | 沈怡自述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 | 一九八八 |
| 杜連慶
陸軍 | 東北軍史略 | 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 | 一九八五年 第二期 |
| 江文江 | 光復後張學思同志在東北 | 遼寧文史資料 | 第十輯
一九八四 |
| 吳相淵 | 熊式輝治軍行政外交 | 民國百人傳 | 第四冊 |
| 高存信 | 高崇民同志年譜 | 遼寧文史資料 | 第十三輯
一九八六
遼寧人民出版社 瀋陽 |
| 高語和 | 我接掌遼北首縣西安回憶 | 東北文獻 | 一卷二期
一九七〇 |
| 栗直 | 東北黨務工作概要 | 東北文獻 | 十七卷一期
一九八六 |
| 袁岡 | 國民黨立委齊世英被開除了黨籍嗎 | 自由中國 | 十二卷一期
一九五五 |
| 曹延亭 | 國立東北中山中學究竟控制在誰的手中 | 遼寧文史資料 | 第十輯
一九八四 |
| 曹壽岩 | 閻寶航是重慶地下黨秘密聯絡站 | 長春社會科學戰線
轉引自《傳記文學》 | 五五卷六期 |
| 曹樹鈞 | 回憶並懷念母校創辦人及歷任校長 | 東北文獻 | 十二卷四期
一九八三 |
| 張玉芬 | 王以哲將軍聯共抗日思想的形成 | 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 | 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
| 張國維 | 義勇軍中一小兵 | 東北文獻 | 六卷三期
一九七六 |
| 舒毅敏 | 東北中學簡史 | 遼寧文史資料 | 第八輯
一九八三 |
| 楊合義 | 清代東三省開發的先驅者——流人 | 東洋史研究 | 三二卷三號
一九七三 |
| 楊合義 | 清代活躍於東北的漢族商人 | 食貨月刊 | 五卷三期
一九七五 |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寧恩承	東北大學話滄桑（上）	東北文獻 一九八九	二十卷二期
臧啓芳	哲先回憶錄	東北文獻 至三卷四期	三卷一期 一九七三
趙中孚	近代東三省移民問題之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四期 下册	一九七四
趙中孚	清末東三省改制的背景	集刊 第五期	一九七六
趙中孚	清代東三省的地權關係與封禁政策	集刊 第十期	一九八一
趙守孚	清代東三省北部的開發與漢化	集刊 第十五期下册	一九八六
趙守仁	評張學良將軍思想演變	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 一九八六年 第一期	
趙守仁	張學良與東北大學	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 一九八七年 第五期	
錢公來	王永江其人其事	東北文獻 一九七四	四卷四期
盧廣績	回憶閻寶航同志	瀋陽文史資料 一九八四	第七輯
盧廣績	九一八事變前後東北人民的抗日救國活動	遼寧文史資料 一九八三	第七輯
關國楨	張學恩其人其事	傳記文學 一九八六	四九卷六期
關國楨	杜重遠	傳記文學	三九卷四期
蕭長林	回憶高崇民同志	遼寧文史資料	第十輯
蕭一山	清代東北之屯墾與移民	學符季刊 一九五八	六卷三期

Robert H.,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a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0).

附錄三：

口述歷史訪問人物表

人 名	職 務	訪 問 地 點	訪 問 時 間
王忠林	高雄師大國文系主任	高雄師大國文系辦公室	七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劉述先	前政大中文系教授	政大教職員宿舍化南新村	七十八年十二月三日 備註：受訪者不接受錄音
包一民	立法委員	立法院集賢樓交誼廳	七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王大任	立法委員	立法院委員第一休息室	七十九年三月十九日
張鴻學	立法委員	備註：電話訪問	七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費希平	立法委員	臺北縣汐止鎮白馬山莊費宅	七十九年二月六日
項乃光	大陸問題資料中心主任	臺北市信義路大陸問題資料中心主任室	七十九年二月七日
張舜光	國大代表	臺北縣新店中央新村張宅	七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韓振學	國大代表	臺中市精誠街韓宅	七十九年四月二日
謝世清	國大代表	臺中市模範街謝宅	七十九年四月三十日
楊仁之	國大代表	苗栗縣三灣村楊宅	七十九年五月八日